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金瓶梅》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金瓶梅》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9号

责 编：王 玮
唐 舰
封面设计：马 强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5 印张 200千字
1992年5月 第1版 1992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80563—200—6/I·011

定价 5.60元

主 编 宁宗一 罗德荣

撰 稿 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卜 键	宁宗一	刘绍智
田秉愕	吕 红	李时人
孟昭连	张国星	罗小东
罗德荣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	-----

第二章 《金瓶梅》：中国小说史上新的里程碑	(17)
-----------------------	------

第一节 小说美学的新观念	(17)
--------------	------

第二节 小说家的小说	(37)
------------	------

第三章 《金瓶梅》的美学意蕴	(58)
----------------	------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空间美	(58)
--------------	------

第二节 罕见的女性世界	(67)
-------------	------

第三节 审美领域的多元开拓	(86)
---------------	------

第四节 非道德化典型观念的创新	(102)
-----------------	-------

第四章 《金瓶梅》的情感意向与作者心态	(115)
---------------------	-------

第一节 在现实的反思中求永恒	(115)
----------------	-------

第二节 笑笑生价值取向的二律背反	(135)
------------------	-------

第五章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157)
----------------	-------

第一节 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157)
-------------------	-------

第二节 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	(181)
-----------------	-------

第三节	人物行为的哲学启示.....	(206)
第四节	西门庆：16世纪后期中国商人的典型...	(226)
第五节	潘金莲：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女性.....	(243)
第六章	《金瓶梅》中的美丑情欲.....	(264)
第一节	美丑都在情和欲之间.....	(264)
第二节	人物、性与审美.....	(279)
后 记		(296)

第一章

导 言

关于《金瓶梅》的价值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仍然执著地认为，无论是把它放在中国世情小说的纵坐标或世界范围同类题材小说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都不失为一部辉煌的杰作。只是由于过去那旧有的狭小而残破的阅读空间，才难以容纳它这样过于早熟而又逸出常轨的小说精品。

值得庆幸的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整体活跃，《金瓶梅》研究才开始沿着复苏、建构、发展的轨迹演进，其研究方法才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课题也由狭窄走向宽阔；小说文本与美学也不断勾连整合，于是《金瓶梅》研究才真正建构成一项专门的学问了，这就是今人泛称之“金学”。

纵观小说文化的研究，流别万殊，而目的则在于探求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的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学术研究究非陈陈相因，而在生生不息。随着社会的变革，文艺观念、小说美学的研究模式的更新也就将同步前进。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骇俗惊世的奇书，我们需要创造性的美学研究，而且应该显示出新时期的审美的和历史眼光的新光芒。所谓《金瓶梅》研究的审美发现，就是要以敏锐的哲理和美学的眼光，透视复杂的内容和它的小说艺术的形式革新，见前人

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炒冷饭”式的议论，是不足以称之为《金瓶梅》高品位的美学研究的。因为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金瓶梅》的研究，其成果都应成为指引读者进入新的境界的明灯。

首先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上，近年来颇有令人瞩目的突破。我们看到了不少文史大家以检验师的敏锐目光与鉴别能力，审视着历史上、古籍中和作品里的一切疑难之点，对此作了精细入微的考证，汰伪存真的清理，尽量做到“论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沉潜往复，颇有乾嘉学派大师们的余韵。当然，在作者问题上至今还未获得共识，可是，这些学者的精耕细作的收获是不容忽视的。

不可否认，在《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用力虽勤，但其弊在琐屑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尽管可以竭研究者之精思，而小说著作者背后的艺术现象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置之脑后。这倒不是说我们对于作家本身行状注意得太多，而是感觉到我们忽视了本不应忽视的对作家心理状态的研究和追寻。现在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小说很重要的一面在于情感性，而情感性又和作家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了解作家的心理，我们对于小说作品中许多情感现象就会莫名其妙。而过去我们不十分熟悉的心理批评在这方面恰恰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这种批评模式强调文学是作家心理欲望的表现，因此它选择的批评途径是直指作家的内心，揣摩作品中蕴涵的作家个人的心理情绪，寻求作家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的印记，挖掘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层微妙意图。人们完全可以不同意这一批评模式的理论根据

——“声名狼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但是却完全有理由借鉴这一模式所采用的方法。如果仅仅因为弗洛伊德学说“毒素”太多，而拒绝借鉴心理分析手法，那很可能不是一种明智之举。过去我们有些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考据文章常常和作家本人的生活道路、特殊心态、创作意图对不上号，同作品本身几乎完全没挂上钩。这说明只凭对作者的一星半点儿的了解，类似查验户籍表册，那是无以提供对《金瓶梅》文本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因为事实是，作品是作家特定心境下的产物，后来人不经心理分析的想当然议论，往往不如作家的朋友的“随意”评论来得贴切，比如欣欣子的一篇序，他的某些提示，有时不免令人拍案，至于张竹坡等人的“读法”和评点，其精彩处也非一般考据所可比拟，它们对我们了解小说作者的心态，特别是创作心绪是大有裨益的。

从别一种意义来说，一部长篇小说往往就是作者的一部“心史”。果戈里就曾说：“坦率地说出一切，所有我最近的著作都是我的心史。”（魏列萨耶夫《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和笑笑生的杰作的纸底和纸背，大多蕴藏着人民的郁勃心灵，同时又表现了他们个人感情的喷薄和气质的涵茹。当然这一切又都是时代狂飚带来的社会意识在杰出作家身上的结晶。但是，如果我们不透过其作品追溯其心灵深处，又如何能领会这些杰出作家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彭·琼生说莎士比亚为“本世纪的灵魂”，那么我们可以说，众多的优秀小说家的杰作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灵魂”。因此，从最深微处说，中国小说也是一门中国社会心理学，一门形象的社会心理

学。歌德比喻说，望远镜有两头，一头扩大，一头缩小，我们既需要“小”，也需要“大”。对待具有心史性质的小说，我们必须深入小说家的灵魂，把握他们的心理脉搏，同时还要透过作家的感情深处或作品的内容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生活细节作为突破口，去纵观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所以有必要看重心史这个侧面，这样，我们的作者生平行状的考察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我们就可以从那纷纭呈现的历史表象的背后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必然有助于真正把握《金瓶梅》的精髓。

至于对于《金瓶梅》的文本，我们当然也不能说研究得很充分了。我们目前的《金瓶梅》研究注意的热点还是集中在它的认识价值上，这可能和这样一种不十分全面的论断有关，比如一位“金学”研究者就曾断言：“《金瓶梅》的价值在认识方面，而不在审美方面。”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仅从叙事学的角度去审度《金瓶梅》的叙事法的审美变革及其审美价值，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堪称是经典叙事规则的娴熟运用。所谓经典叙事具有引导读者向小说同化的内容和形式，即表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展示怀有愿望的主体对愿望客体的永恒追求，然而客观现实总是阻碍和拖延愿望的实现。《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逼上梁山是如此，《西游记》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更是如此。它们一开始，叙事就总是打破主体的平衡状态，让主体与其愿望对象之间存在一段“最初距离”，在主体实现愿望的过程中，设置一系列障碍、假象、破坏、不幸等中间环节，主体总是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越过障碍，最终达到目标，情节的发展尽管一会

儿奇峰千仞，一会儿跌落平阳，但仍然还是从不平衡状态恢复到平衡状态。故事中主体愿望与客观障碍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是经典故事的推动力，愿望主体追求愿望客体的过程，对于读者深层心理具有一种深深的魅力，它吸引着读者向主人公认同，向故事同化，并参与故事的发展过程。

可是，《金瓶梅》却打破了这种经典叙事模式，这当然同《金瓶梅》的题材有别于上述诸杰作有关，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那些作品运用的经典叙事模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金瓶梅》创造性地选取了吸引读者把自己投射于故事中的叙事方式，这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出独特的故事来，而其技法则是根据普通生活塑造出故事角色，故事创作者的本事就体现在通过角色一目了然地“公开经历”，于是，西门庆、应伯爵、陈经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等人物，一步追一步，一层深一层地开掘、发现，提出其人生未知领域的疑问。在这里全然没有经典叙事模式中怀有愿望的主体对愿望客体的永恒追求，没有一连串客观现实阻碍和拖延愿望的实现，也没有叙事开始打破主体的平衡状态，让主体与其愿望对象之间存在“最初距离”，情节发展似也没有太大的升降，甚至令人感到“平铺直叙”。进一步说它也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数百个故事中可以概括出来的“诸葛亮式”、“曹操式”、“刘备式”、“林冲式”、“武松式”、“李逵式”、“唐僧式”和“孙悟空式”那种性格类型和情节类型，它似空无依傍，又都一个个地生成为独特的人物，构筑为一个个性格的历史——情节。因此，《金瓶梅》的艺术创造的精髓恰恰在于创作者对生活生生的现实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总之，笑笑生自觉或

不自觉地并未完全运用或者说他在关键处几乎改变了经典小说叙事常见的引导方法，这种引导方法实际当属当今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控制审美距离的方法，即在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拉开距离。如果我们从研究者角度来审视，这种审美距离控制主要有如下几种：理智的距离，即指上述四者对事件理解上的差别；道德的距离，指四者道德观念上的差距；情感的距离，即指上述四者对同一对象厌恶、同情等不同情感的区别；时间的差距，指作家写作、叙述者叙述、人物的活动及读者阅读之间时间上的差距；身体的差距，指作品中人物与读者形体上的差异，如西门庆的伟岸，潘金莲之淫荡，与一般读者显著不同。这种在审美距离上的反差越大，在价值、道德与理智上造成的“间离效果”就越大。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审美距离控制模式具有现代性，它再不是简单地套用经典叙事模式引导读者全方位的介入，而是让读者既介入又不完全介入。无疑，这当然和《金瓶梅》写的是丑和恶而不是美与善有关。不过，我们认为用距离模式来分析《金瓶梅》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发现其叙事法的审美特色，确实是一个很有实践价值的参照结构。我们现在国内的《金瓶梅》研究还停留在总体研究水平上，进入这些微观层面，采用审美距离控制作为参照系来细致分析与描述，还有待提高和注意，因此，我们想，审美距离理论也许真的会给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有益的启发。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到了在《金瓶梅》的研究领域，如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极普遍又亟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创制小说研究的

理论范式,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莫不始于阅读。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阅读空间的重建是文艺批评和研究完成蝉蜕和更新的内在动因。“两难之境”的发现和确认,实际上是对重建阅读空间的一种觉醒和要求。例如意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必要,使英美新批评提出“细读法”,以“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的相遇”为前提,意识批评中的乔治·布莱建立并发展了认同批评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认识文学的基础,夏尔·莫隆力图在作品中发现从顽固比喻到个人神话之间的通道。为了寻求终极的结构模式,茨维坦·托多洛夫可以把一本书当作一个句子来加以分析。试图打破罗各斯中心主义,雅克·德里达可以拆散本文的结构而实现意义的多元化。为了在艺术创作中起用久被忽视的读者,接受美学中的康斯坦学派反复强调作品的召唤结构等等。诸如此类导致文学研究一次又一次完成蝉蜕的努力,无一不起源于一次比一次强烈的重建阅读空间的愿望。批评的问题,研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要拓展“金学”研究者的思维空间,首先要重建“金学”研究者的阅读空间。

《金瓶梅》阅读空间的狭小与残破,早已使读者和研究者有窒息之感了。且不说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阅读方式,使多少“金学”研究者竭力在作品中调查西门庆的财产,给人物划成分,或者千方百计地追寻作者阶级归属与政治派别,以为如此即可纲举目张,抓住作品和人物本质;也不说经济决定论使多少研究者四处搜罗数据以构筑所谓时代背景,以为生药铺的产量和吞吐量中隐藏着小说的秘密。也不说机械反映论使多少“金学”研究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把“通过什么反映什么”当成万古不变的公式,死死

地套住任何落在眼中的小说。仅以所谓“阶级局限”四个字，就使多少“金学”研究者的研究文字失去鲜活的生命。他们忽视了作家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作品可以是互相矛盾的，也不懂得聪明的作家往往不在想象的作品中直接表述其政治立场和哲学观念，也不愿承认成功的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是自由的、不肯轻易接受作者主观意图的摆布。因此，在一些研究者中在遇到矛盾时，不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而是挖空心思甚至牵强附会弥合矛盾，其结果，要么以“局限”之名从轻发落，要么一厢情愿地修改历史。这种现象在《金瓶梅》研究中不是毫无表现，究其原因，阅读空间的狭小与残破，当在考虑之列。

要重建阅读空间，必须打破单向的线性阅读方式，开辟多向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建设性的文化性格。然而，这一切非有一种新的阅读心态不可。面对小说《金瓶梅》，研究者是否高级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批评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批评方法，研究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无论如何，阅读心态都不是可以不闻不问的，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态度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败。我们有必要再一次说明，面对《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轨的小说精品，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研究和批评。

在这里，我们应作说明的是，拓宽阅读空间只是吸收了

接受美学对本文阅读再创造的观念，不同意把作品封闭起来排斥任何外缘的了解，但决非赞成无限度夸大批评与阅读的
主体性发挥。我们希望的是切实而又开放的批评眼光，并不
主张猎奇式的“玩批评”或“新名词轰炸”。我们把解读
《金瓶梅》是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现代的解读小说学应是
开放式的本文细读与有限度的审美接受的结合。解读《金瓶
梅》是征服困难，从而给读者一把体味与理解《金瓶梅》的
钥匙。

写到这里我们又要涉及到“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
题，即“金学”研究是否真有“溢美倾向”？一个普通常识
是，对待任何一部作品都应有一个客观标准，但这个客观标
准并不排斥中国俗语中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
在外国的文学研究中也有类似情况，自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
以降，不少批评家力倡一种“有所偏袒”的批评，不再以全
面、公正、成熟相标榜。这“偏袒”自然不是盲目的吹捧或
粗暴的践踏，而只是情有所钟、意有所会所产生的一种心
态。小说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是一种特殊的对象，若要接
近并掌握它，也许局部的、片面的、不成熟的、未完成的阅
读行为要比任何“深入”或“穷尽”的企图更为忠实，这是
研究者应有的明智，因为他始终处于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那
种“不疲倦的运动”之中，他一旦停下来，阅读行为即告结
束，阅读空间也随之瓦解，所谓“深入”、所谓“穷尽”，
都是可以不论了。因此，我国有的批评家径直地提出“深刻
的片面”，实在是一种深谙文心的真知灼见，而不仅仅是对
宽容的一种呼唤。倘若批评家果然于沉潜往复中情有所钟，
或出现溢美倾向，那就尽可以不断地扩大“深刻的片面”，

而不必担心会受到嘲讽。在小说批评史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都极少见过深刻的全面，如能有一、二乃至更多的“深刻的片面”，已经可以让读者感到满意了。当然我们也不是提倡任何的“片面”，只是深深感到，对文学研究来说，“全面”和冷峻的不偏不倚的面孔永远是一种幻想，更不用说“深刻的全面”了。遗憾的是，这幻想至今还盘踞在某些个别“金学”研究者的头脑中，并使他宁肯追求肤浅的全面而不去接受“深刻的片面”，这里我们倒要呼唤宽容了。

批评《金瓶梅》研究的“溢美倾向”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的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曾有意无意地规定了小说作者应当怎么写不应当怎么写。比如说：“《西游记》的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有那样‘昏暗一团’呢？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却决不是‘昏暗一团’的。”（徐朔方、刘辉主编《金瓶梅论集》）这一论述显然与文艺创作规律不符。因为正象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在同一时代背景，也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性、性灵、内外阅历、感受和体验。因此，对于一部杰作来说，与其说是对象主体的魅力，不如说是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的魅力。所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描绘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都可以使用明亮和阴暗两种色调，因为历史的面貌本来就是由这两种色调构成的，光明中有黑暗，黑暗中有光明，只是不同时期主次关系不同而

已。一段光明的历史，不会因为有人抹了几笔阴影就失去了光明，一段黑暗的历史，也不会因为有人投下几道光亮就会令黑暗遁去，作家的笔触是有自由的，他观照的角度也是自由的，今人很难干预。重要的是，在一片斑斓驳杂的色彩中，人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小说创作的生命是真实。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既要避免刻板式的照搬生活，也不能借口“主流”、“本质”而回避生活的阴暗面，给读者一种廉价而虚伪的安慰。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更应如此要求。不错，《金瓶梅》的色调是阴暗的，结论也近乎悲观，令人颇感不快。这种不快所包含的感情是愤怒和不平。近乎悲观的结论居然是正确的，是因为它来源于环境和人物的真实性，而人物的真实在于环境的真实，环境的真实又取决于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的真实。进一步说，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们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则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和叙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